

农地流转与产业转移

——研究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

袁国龙 林金忠

内容提要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各方争执不下,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以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切入口,结合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研究我国的人口红利以及所谓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只适用于我国的局部地区,同时,区域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先后具有时空层次性与梯度性特征。

关键词 农地流转 产业转移 刘易斯转折点

袁国龙,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361005

林金忠,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361005

一、引言及研究述评

一般认为,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与人口红利密不可分。依托国际产业转移,充分利用我国农村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推动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人口红利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2004年以来,东部沿海持续出现民工短缺、民工回流以及工资上涨等问题,使得我国经济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人们不禁要问,我国是否还存有人口红利。面对如此的困惑,当前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应该是,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1]?

目前我国学界对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主要有两种:第一、工资标准,即现代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是否上涨与趋同;第二、数量标准,即非农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消失(周燕、佟家栋,2012)。根据这些标准,学术界对上述基本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以蔡昉、都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12YJA79008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2CJL028)阶段性成果。

[1]本文所称的刘易斯转折点沿用的是刘易斯(1954)对于二元经济转折点的定义,与费景汉、拉尼斯(1964)所定义的“刘易斯第二拐点”相符。

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 指数构建及其国际比较

刘晓星 赵鹏飞 卢 菲

内容提要 秉持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服务理念,基于金融稳定、金融发展、金融消费者保护三大金融监管目标体系论证选取了16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因子得分和赋权加总,构建了涵盖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大金融领域的金融监管综合指数,分别在空间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对全球范围内64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指数进行了国际实证比较。结果表明,金融监管指数分析很好地拟合了全球与各国的金融监管状况和趋势,揭示了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结构特征和整体表现,为金融监管整体评价和监管主体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监管指数 监管目标 主成分分析 国际比较

刘晓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11189

赵鹏飞,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11189

卢 菲,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 510320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关现代经济社会稳定。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使人们再一次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巨大的负面冲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危机逐渐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但金融体系随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变得庞大繁杂,日趋互联的金融经济社会系统使得传统的金融监管作用受限,需要人们以国际化的协同大视野加快对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因此产生了新巴塞尔协议3这一改革进程成果。目前关于金融监管的制度规章很多,但对于其实施的金融监管效果缺乏有效的量化评价,而是囿于对金融监管效果的定性描述或简单数据分析。面对金融全球化、监管国际化和趋同化的发展态势,如何通过量化分析精准及时有效的把握金融监管效果和存在的监管问题,针对瞬息万变的金融体系制定相应的监管预案和对策,构建一个反映金融监管水平且可用于国际比较的综合性监管指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973028,71273048),东南大学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编号:SKYD20110006),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的部分成果。

协 同 与 创 新

——员工帮助计划与企业社会工作关系研究

张宏如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期强化精神方面的制衡机制迫在眉睫,EAP 与企业社会工作的重
要性已愈加凸显,二者的协同性主要体现在背景吻合、内容融合和价值契合,创新性体现为
结构模式、评价体系与宏观视角的创新,有机融合 EAP 与企业社会工作基础内涵,诠释的互
为创新独特价值,有助于建构我国文化语境的 EAP 与企业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体系。

关键词 EAP 企业社会工作 协同 创新

张宏如,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210093
常州大学教授 213164

我国现已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的中国与心灵的中国差距急剧拉大,强化精神方面的制衡机制迫在眉睫。作为促进员工与企业和谐发展的企业社会工作与员工帮助计划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简称 EAP),其重要性愈加凸显。EAP 与企业社会工作的研究已成为时代的热点课题,二者的关系研究学术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 EAP 是企业社会工作的模式与手法^[1];另一种典型观点主张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就是 EAP^[2];也有研究提出 EAP 是企业社会工作的扩展并研究基于企业社会工作的 EAP 流程^[3]等。目前国外 EAP 研究呈现出其领域不断扩展、融合互补其它福利项目的显著特点,企业社会工作也正通过 EAP 深度融入人力资源管理。我国当前传统企业社会工作融合企业管理不够。从国内积累与国外经验来看,发展我国的企业社会工作的契合点和现实途径在于将企业社会工作有机融入组织管理系统。本文围绕 EAP 与企业与社会工作机制创新主题,从协同与创新层面有机融合 EAP 与企业社会工作基础内涵,解读企业社会工作的终极使命与 EAP 的需求契合,诠释互为创新的独特价值,探究我国文化语境的 EAP 与企业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员工帮助计划与企业社会工作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CSH091)阶段性成果。

[1]周沛:《企业社会工作》,[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21 页。

[2]谢鸿钧:《工业社会工作实务——员工协助方案》,[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2-6 页。

[3]陈晓敏:《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社会工作》,[长春]《企业研究》2006 年第 7 期。